

中 國 皇 帝 后 妃 傳

皇 帝 后 妃 傳



ONE HUNDRED BIOGRAPHYS
OF THE EMPERORS AND
EMPRESSES IN CHI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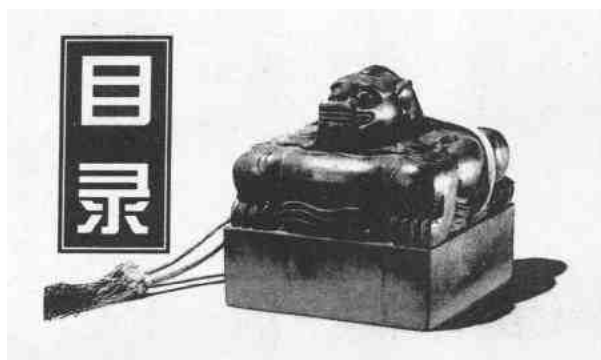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皇帝皇后百传



明 熹 宗

远方出版社

（此图选自《中国皇帝皇后百传》一书）



第一章	先帝光宗之际遇	(1)
第二章	怪胎仓促继位	(34)
第三章	专宠魏忠贤	(76)
第四章	频兴大狱	(121)
第五章	阉党专权	(175)
第六章	身死于内忧外患	(212)

CH 241/64



第一章 先帝光宗之际遇



一、艰难储位路

大婚之后，朱翊钧便与生母慈圣皇太后分在两宫居住，他自己与皇后王氏居住乾清宫，慈圣太后则搬进了专门为她修建的慈宁宫。每天，朱翊钧照例都要向两宫皇太后请安，有时闲得无聊，也到慈宁宫来坐坐，陪母亲说两句话。作为一个以孝子自许的人，朱翊钧十分注意博取母亲的欢心。

万历九年（1581）十月的一天，朱翊钧又来到了慈宁宫，正巧太后不在，朱翊钧要索水盥手，一位姓王的宫女便舀了一盆水进来侍候，也许是第一次侍候年轻的皇上，这位宫女因有些腼腆而显得秀气可人，朱翊钧一时性起，便与她发生了两性关系。宫中美女成群，发生这样的事，在朱翊钧只不过是家常便饭，帝德乾坤人，皇恩雨露深，只是这位宫女是太后身边的人，按照宫里的规矩，照例要由太后象征性的赏赐以后才可同房，不过，这样的规矩，从来就没有一位帝王认真执行过，朱翊钧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很快，这位长相一般，年龄又比他大的宫女就被遗忘了。

世间的事情真多巧合，在此之前，经朱翊钧正式册封的妻子就已有一后二妃九嫔，竟都一个不孕，而他与王氏宫女的这一次野欢苟合却珠胎暗结。来年春天，宫女的肚子便一天天地鼓了起来，细心的太后发现了这一切，宫中只有朱翊钧这一个





真正的男人。一天，母子用膳已毕，慈圣太后便向儿子谈起此事。不知母后用意，朱翊钧矢口否认。太后随即命人取来起居注，上面清楚地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皇上于某处与某宫女发生性关系，并赏赐头面一副。朱翊钧顿时面红颈粗，黄纸黑字，不得不低头承认。紧接着，太后要朱翊钧给这位宫女确定一个名份，眼见儿子一副不太乐意的样子，似有意嫌这位宫女出身低贱，便又和言细语地劝道：“我已年老，尚未抱孙，如果生下个男孩，则是国家社稷之福。母以子贵，怎可分高低贵贱呢？”朱翊钧这才不得不应允下来。

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二十六日，朱翊钧让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张四维持捧节册，册封王氏为恭妃，册文是由阁臣们草拟的，由于张居正病重，由张四维会同中时行共同完成，内称“王氏惠质夙成，温仪为度，衾裯肃肃，既承鱼贯之恩，亏韦雍雍遂兆，燕谋之吉睹徽猷之茂著，迓景福于方来，宜溥渥恩，特升华序”。这并不能代表朱翊钧的心思，次日百官要求朝贺，朱翊钧诏令传免。八月十一日，王恭妃果真产下一个男婴，这便是日后的光宗朱常洛。

皇后无出，朱常洛便是庶长子，按照宗法继承原则，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他的身份将与今后其他非皇后所生的皇子地位不同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何况这还是皇家长子。这回朱翊钧确实是真的高兴，次日即传谕内阁，诏令从太仓库和光禄寺提取银两三十万以备赏赐。第三天，又派遣成国公朱应祜、恭顺侯吴继爵、武清伯李伟、彰武伯杨炳分别祭告郊庙、社稷，而自己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，恭妃的兄长王道亨被授予锦衣卫带俸指挥，辅臣及讲官各赐银币，两宫皇太后各增徽号二字，同时诏告天下，令普天同庆。

不过，恭妃并未因此而获得朱翊钧的宠幸，她的名份和地位也未再得到晋升。朱翊钧此时情有独钟的另一个女人，却是年轻美丽、善邀君宠的郑氏。郑氏是河北大兴人。万历十年



(1582)三月，入选九嫔，被册封为淑嫔。次年八月，即从九嫔中脱颖而出，被册为德妃。一年后又晋封贵妃。对于朱翊钧无可奈何地册封王氏为恭妃之举，经常成为她与朱翊钧游戏时的玩笑，每每称呼他为老妈妈，暗行讥刺，弄得朱翊钧嘿然而不自得，更加疏远王氏，常规性的恩礼也一概从薄。

事情如果就此而止，倒也不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。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，郑贵妃也为朱翊钧生下一个男孩，算起来这是朱翊钧的第三个儿子，取名常洵。两年前，还有一个女人为他生过一个男孩，即次子常淑，常淑只活了一岁，便夭折，后被追封为郧王，谥曰哀。因而，常洵又成了实际上的皇次子。

爱妃产子，朱翊钧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兴，除了一应礼仪俱照皇长子的以外，还特意诏谕，要传升礼仪房供事员役，晋郑贵妃为皇贵妃。按照宫中规制，皇贵妃仅次于皇后，可以统率六宫，名份和地位在恭妃之上。朝臣们的神经立刻敏感了起来，莫非皇上要将宠妃所出立为皇储？

首辅申时行最先感到了事态的严重，近年来，他一直忙于追查张居正党人和营建寿陵等事务，竟然将立储问题完全置于脑后。于是，在二月初三日这天，申时行呈上了第一道请立东宫的奏疏，振振有辞地举了一大堆理由：“窃惟国本系于元良，主器莫若长子，故汉臣有云：蚤建太子，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。仰惟皇上受天眷命，猷祖洪图，德泽浹于寰区，嘉祥钟于胤嗣。自万历十年元子诞生，诏告天下，五年于兹矣，即今麟趾蚤斯，方兴未艾，正名定分，宜在于兹。查得祖宗朝故事：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为皇太子，时年二岁；宪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；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，尚未周岁也。盖豕岁升储，所以明震器之重，冲年貽哲，所以端蒙养之功，成宪俱存，昭然可考。今元子聪明克类，岐嶷夙成，中外臣民属心已久，及兹睿龄渐长，阳德方亨，册立礼仪，允宜修举。伏望祇率祖宗之旧章，深惟国家之大计，以



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，早建储位，以慰亿兆人之望，以固千万世之基。至于，出阁讲学及朝贺等仪，稍俟一二年后，睿体充实，次第上请，伏惟圣明裁断施行。”奏疏被朱翊钧委婉地驳回：“元子婴弱，稍俟二三年举行”。两天后，申时行再上一道奏章，又罗列了一些新的理由：“自古享国长久，莫若成周；善辅养太子，亦莫著成周。盖自孩提有识，而已备师傅之官，抗世子之法矣，何者以少成若性，胎哲自初，不可不早建而预教也。本朝列圣建储，多以冲年，实取法成周遗意。今元子方及五龄，虽未甚壮，然比之宪孝两朝，实已过期矣。如欲修讲学之故事，备朝贺之盛仪，恐婴弱之年，勤劳未习，臣等岂不知仰承盛意，爱惜睿体。今但举行册立之礼，在宫中不过一受册，在文华不过一受朝仪，不甚繁劳。不甚久而名号既正，则千万世之统攸关，典礼一新，则亿兆人之心斯慰。臣等所以不避烦渎而再有恳祈者也。伏祈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，为久安长治之图，先议册立以正储位，其讲学等仪尊奉明旨，少俟二三年举行，则胎燕之谋、保爱之道，两得之矣”。申时行近乎哀求的奏疏，未能改变朱翊钧的主意，传谕仍依照前旨而行。

科道官也闻风而动。就在申时行第二道奏疏被驳回的次日，在京的各科给事中和各道御史也交章请立东宫，全部被朱翊钧以“知道了”三个字打发过去。

又次日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（1546—1630）再单独上疏，直接捅破了众大臣几欲明言而又未敢说出的话，把矛头指向晋郑氏为皇贵妃一事，“恭睹圣谕，贵妃郑氏着进封皇贵妃。臣愚窃谓礼贵别嫌，事当慎始，贵妃以孕育蒙恩，岂曰不宜，但名号大崇，亦所宜虑。贵妃虽贤，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，犹然亚位中宫，则恭妃诞育元嗣，主鬯承祧，乃其发祥，顾当翻令居下耶，揆之伦理则不顺，质之人心则不安，传之天下万世则不典，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。伏乞皇上俯从未议，收回成命，以协舆情，或情不容已势不可回，则愿首册恭妃为皇贵



妃，次及贵妃，两典一时不妨并举，则礼既不违，情亦不废，长幼之分明，而本支之义得矣。抑臣者所议未也，未及其本也，皇上诚欲正名定分，别嫌明微，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，以定天下之本，则臣民之望慰，而宗社之庆长矣”。

这下可触怒了朱翊钧，人臣窥探主上心理，大为不敬，诏令降任极边杂职，结果姜应麟被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。当日，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也上疏请立皇储并及议封皇贵妃、并封恭妃，被降三级，改任行人司司正。

其实，升储之仪，如果发生在一年前，阁臣、科道力为羽翼，朱翊钧既不会多心，朱常洛或许也早已得立储。如今，郑贵妃生子尚未满月，朝中便是一片促请立储的呼声，其用意不言自明，这更使得朱翊钧产生了一种逆反抵触的心理。因而，当阁臣、科道交章论救姜、沈二人时，朱翊钧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，不过，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，朱翊钧明确提出了立储以长幼为序的原则，声称祖宗家法，万世当尊，自己仰奉成宪，俯察舆情，岂敢以私意违拂公论。国本有归，自己已明白晓示，待期举行，各官宜体察皇上的心意，不许再妄疑渎扰。这实际上便是否决了谣传要册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的说法。

然而，朱翊钧的一些做法，又使得朝臣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。三月初二，朱翊钧还是正式册封了郑氏为皇贵妃。册文是这样写的：

朕惟化理之基，恒资乎贤淑，褒嘉之典，必视其
劳动，位以德迁，制綵议起。咨尔贵妃郑氏，妙膺
媛选，婉婉有仪，清受妃封，恪共犹著，朕孜孜图治，
每未明而求衣，尔肃肃在公，辄宣劳于视夜，厥有鸡
鸣之助，匪徒鱼贯之充，矧梦既应于熊祥，而庆克昌
乎麟趾，益徽令德，宜荷渥恩，兹特以金册金宝遣使
持节进封尔为皇贵妃。



本朝后妃中，由贵妃晋为皇贵妃的，在此之前，仅成化间，万贵妃一人，而万氏专宠，曾引得朝野不宁。

其时，天下大旱，朱翊钧诏令有司条奏便利之务，一时间，部曹大臣的奏疏大多都涉及到郑贵妃事，礼部也再题覆阁臣及科道等疏请册立皇长子的奏疏，朱翊钧干脆全部留中，不予理睬。为此，刑部江西司主事孙如法、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又以言论偏激，分别受到降职和罚俸的处分。

转眼就是一年过去。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正月，新春伊始，中时行又上了一道奏疏，请立东宫以及将皇次子封王。表而上，朱翊钧将阁臣们褒扬了一番，着令他们候旨举行。而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，将此事搁置起来。一些科道官们也上疏奏请建储，仍然是不被理睬，刑部员外郎李懋桢、主事刘志选分别被降为湖广按察司经历和福宁州添注判官。此后，朝臣年年周而复始地旧话重提，言词和缓者，或答以“知道了”，或留中不发，语句偏激的就施以处罚。

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四月，郑贵妃的父亲、锦衣卫都督同知郑承宪去世，他的兄长郑国泰提出要承嗣父职，本朝律法流官不得世袭，以往也无此先例，兵部以为不妥，但朱翊钧还是坚持要授予郑国泰为都指挥使，兵科给事中张希皋请求收回成命，又是泥牛入海，没有反响。

在立储的问题上，朱翊钧与朝臣们较上了劲，一方是喋喋不休地不断上疏，另一方却是不管你有千条妙计，我自有一定之规。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，朝臣们又展开了新一轮请求册立皇储的攻势。由于此前刚发生雒子仁上酒色财气四箴之事，朱翊钧心中特别窝火，将领头疏的礼部堂官重重地斥责一番，“你们纷纷烦扰，难道要离间我们父子吗？”

眼见一时难以说服朱翊钧立储，阁臣们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，请让长子先出阁讲学，由皇上自己走出日期。阁臣们的用意，朱翊钧心中自然是很清楚的，因而还是将所有的奏疏压



下，不予表态，又让阁臣们碰了冷钉子。

一计不成，阁臣们又生一计。十月十一日，立冬，先由许国上疏，奏称病重，请早定皇储，则自己去留皆安，朱翊钧未予理睬。三天后，吏部尚书宋纘、礼部尚书于慎行又率百官疏请，遭到朱翊钧的斥责，首辅申时行率阁臣疏请也被驳回，于是阁臣们全部称病谢罪，王锡爵还明确提出要致仕还乡，四位阁臣，只有王家屏一人入直，其他三位都在家中泡病。

阁臣的联合行动，使内阁的正常运作趋于停滞状态，朱翊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的姿态，表示对阁臣的优礼。二十三日，鸿胪寺宣慰官奉朱翊钧之命，分别前往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家中，表示朕倚任内阁，赞襄治理，所赖分忧，共念一德相成，前者西陲不宁，烦嚣沸起，一切妄言，朕皆置之不理。昨日已同意首辅所奏，命廷臣会议军国大计，正需你们主持。至于册立太子之事，纶序已定，稍等时日，候旨举行，并且也需要你们来决策，现在你们都杜门不出，交章乞休，只考虑自己洁身自好，却将皇上置于何地？今特派鸿胪寺官前来宣慰，希望你们尚念朕对你们的股肱之托，共图羽翼之功，勉为国家之事留下来，赶快到阁办事，不要再生疑虑，辜负朕对你们的眷怀。

朱翊钧的这番漂亮言辞和高姿态的举措一出，申时行三位也立即具疏陈谢。不过，久与朱翊钧相处，为国本之事又已争了五年，对朱翊钧的言行自然还是将信将疑，三人于是又分别上疏奏请建储，具体职司此事的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也乘机上疏请立，内称臣等待罪礼官，关系职掌，如果到期而不奏请，责有所归，至于长幼之分序已定，迟早之间，似可无需顾虑，臣等亟请举行，惟以早立则侍从可简，谕导可修，人心可安，而烦言可息。果然，朱翊钧没有这样的诚意，对三位阁臣的奏疏，他没有发作，对于慎行等人却又重重地斥责了一番，指责他们要君疑上，淆乱国是，将他们罚俸三月。



申时行三位依旧称病不出，朱翊钧向王家屏表示了对他们的不满，同时派身边的太监李俊告诉王家屏：建储之礼，当于来年传立，廷臣不要再上奏烦扰，如果再有奏请的，等皇长子过了十五岁以后再说。这已完全是意气用事，偌大的朝廷，朝臣又如此众多，总会有人耐不住性子脱口而出，到时朱翊钧便有了托词。王家屏也与朱翊钧耍起了心计，便奏请传示朝臣具体时间，至于十五岁以后再说一句则被隐去，同时考虑到朱翊钧未必会同意他的这一意见，又把李俊口传的一段话录报礼部。于慎行于是根据王家屏的录报，当日再次上疏，内称根据皇上口谕，已通过南北诸司，传示大礼有期，让大家静候，也将十五岁以后再说一句隐去，试图造成既成事实，迫使朱翊钧就范。朱翊钧识破了王家屏的用意，立刻让李俊前往责问。王家屏奏辩，宗社大计，非自己一人所能定，故此才晓示廷臣，朱翊钧未予理睬。

四天后，王家屏再上一道奏章，疏称天语口传、宣布未周，不如亲发纶音，拟揭帖一道，播告尤速。朱翊钧则答以只需口传，同时对先前的许诺又做了修改，将预定的册立日期又后推一年，来年先筹办钱粮，后年春天再行册立，如果再有人奏请，到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。而现在朱常洛是十岁。

廷臣们果真也没能沉住气。次年八月，皇五子常浩出世，又勾起了朝臣们再请立储之事。二十一日这天，一直称病没有上朝的申时行上了一道奏章，请求重申早先的诏谕，于次年春天举行立储大礼。工部尚书曾同亨更是赤裸裸地说出了自己的疑虑，希望不要再改期，朱翊钧没有表态。第二天，一封由礼科给事中张有德起草，阁臣申时行、许国、王家屏合署请于明春立储的奏疏又放在了朱翊钧的而前，引起了他的怒火，朱翊钧派人诘问申时行。按照本朝故事，凡是内阁的奏疏，照例都是首署首辅的名字，申时行为了洗刷自己，赶紧申辩自己不知此事。作为一名首辅，此时此地不是勇于承担责任，进一步劝



说皇上，而是说出这番话来，要推卸自己的责任，自然在朝臣中也丧失了威信。许国心恢意冷，称病离京回乡；申时行在言官的不断弹劾下，只好告老还乡。王家屏也提出了辞官的请求，朱翊钧没有同意，告诉他如今二辅回籍，自己要亲览章奏，卿可遵旨入直。同时，根据申时行致仕前的举荐，晋史部侍郎赵志皋为礼部尚书，前礼部侍郎张位为吏部侍郎，并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

新的一届内阁，无论是才学，还是资望，都还不如上届。于是朱翊钧想到了回乡省亲的王锡爵。王锡爵此时正连上几道奏章，请求在乡终身侍奉父母，朱翊钧没有应允，并几次派人催促王锡爵起程进京。冒着凛冽的寒风，拖着病残之躯，除夕日也未歇息，王锡爵风尘仆仆进京赴命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正月十五日，正是万家团聚，共度元宵的日子，王锡爵赶到了北京。尽管在申时行、许国致仕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廷臣中再也无人奏请立储，朱翊钧自己也闭口不提此事，立储之争，依旧是一个无可回避、令人棘手的难题。为了打破眼下的僵持局面，二十二日，王锡爵风尘未洗，便呈上了一封密揭，奏请三位皇子同时封王，这一新的意见，立即得到了朱翊钧的响应，连连称好，并派文书官李文辅将自己的御笔手札送到王锡爵的手中，内称自己近读《皇明祖训》，见其中有立嫡不立庶之条，况且皇后还年轻，如今你提出三皇子并封，再稍等几年，皇后若还无生养，再行册立。于是，王锡爵将御礼放入袖内带回家中，草拟了两道传帖，供朱翊钧采择：一是依照明德皇后抱妃子之子的先例，由王皇后抱皇长子为子；二是三王并封。

十九日，朱翊钧传谕礼部：“朕所生三皇子，长幼自有定序，但思祖训立嫡之条，因此，少迟册立，以待皇后生子，今皇长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长成，皇第五子虽在弱质，欲暂一并封王，以待将来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尔礼部便择日具仪来行”。



石激起千层浪。诏谕一达礼部，尚书罗万化、给事中张贞观等在场大臣顿觉事情不妥。便赶往王锡爵家中询问缘由，王锡爵拒不出见。次日，光禄寺丞朱维京（1549—1594），这位来自江西万安县的原工部尚书朱衡（1512—1584）之子，率先上疏切谏，指出先前有二十一年册立之旨，如今或然改为分封，失去臣民仰望之心，昧爽人主大信之道，并称只听说立嗣以嫡，无嫡以长，而没听过有稍缓册立，以待嫡嗣之说，本朝开国以来也从未有过此制。刑科给事中王汝坚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。朱翊钧诏令将此三人发戍极边。然而，廷臣们并未就此被震住。第三天，礼部仪制司主事张纳陛、顾宪成，工部都水司主事乐元声合疏劝沮。第四、第五天，光禄寺少卿余傑、寺丞王学曾，礼部主事陈泰来、于孔兼，礼部尚书罗万化，翰林院编修周应宾等也分别上疏劝谏，朱翊钧诏令将余傑发戍极边，以儆效尤。

于是，群情激愤的廷臣们，把全部不满都倾泄在三王并封说的始作俑者、首辅王锡爵身上。礼科都给事中李汝华、张贞观、许弘纲，吏科给事中史应麟等人来到内阁，质问王锡爵。庶吉士李腾芳为此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历数三王并封将贻害无穷。只有国子监祭酒曾朝节一人认为可行。

经众臣的再三争辩，王锡爵发现自己的建议确实有欠深思。二月初二，王锡爵奏请将三王并封事交廷臣集议，朱翊钧没有同意，告以自己主意已定，不必廷议。初六这天，再上疏引咎，辩称自己当初在没有查考典章、会商其他阁臣的情况下，仓促所拟的意见未能深谋远虑，请求予以改正。显然，这是朱翊钧所不能接受的，他当即颁下谕旨：“朕身为人君，耻于被臣下挟制。如今卿又呈上这样的奏疏，如果卿自认有错，又将朕置于何地？朕正要与卿商量一个另外处置的办法，卿不要党附众人，激朕恼怒，以辜负朕的心意。既然卿现在又说出这番言论，不如三位皇子都不封王，再过二、三年，如果皇后





仍然不育，再行册立”。争了半天，问题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原来的状态。

无奈，王锡爵连连上疏，请求致仕还乡，朱翊钧不予批准。王锡爵再请上朝，召见大臣，朱翊钧依旧称病不出。君臣关系再度僵持起来。

七月的最后一天夜晚，火星逆行室度，天空出现了星变。王锡爵于是借星变又做起了文章，疏称自己连夜仰观天象，见彗星已入紫微垣，上天以皇上为子，皇上以太子为子。就一家伦序而言，此足相当，天子是帝星，太子属前星。就三垣方位而言，又最相近，如今禳雪的第一要义，莫如尽早册立太子。朱翊钧借口此前有过二、三年再说之旨，不便食言，又敷衍了过去。三位阁臣再上奏疏请求，朱翊钧又是置之不理。其他朝臣便也难得再去搅这淌浑水。

然而，皇长子一天天在长大，即便暂时不被立为皇储，传统的皇家儒学教育也该着手进行。以往，廷臣们在请立皇储时，也曾涉及这一问题，俱被朱翊钧搁下。十一月十九日，是慈圣皇太后的寿诞，朱翊钧出御皇极门接受百官朝贺，退朝以后，将王锡爵单独召至暖阁以示优宠。乘朱翊钧兴致正好，王锡爵又提出立储时，朱翊钧没有答应，便转而提出皇长子出阁豫教之事，朱翊钧表示同意于来年春天举行，但要附加两个条件，一是皇三子要与皇长子同时出阁，二是皇长子见讲官要穿常服，而不能行东宫之仪，穿亲王之服。经王锡爵再三劝解，朱翊钧勉强同意皇三子暂缓一年，但对皇长子出阁用常礼则坚持不改。
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二月，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，一应礼仪全部从简，侍卫仪仗也一概免去。及开讲之后，按惯例，寒暑两月都要辍讲，朱翊钧却坚持不允。有这样一件事：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十一月的一天，北风呼啸，北京的天气极为寒冷，朱常洛照常出阁讲学，新年的履耳尚未赐戴，两只



耳朵冻得通红，周身直打寒颤，讲官郭正域实在看不下去，大声说道：“天寒如此，皇长子乃是宗庙神人之主，玉体固当万分珍重。即便讲官也是添列禁近，如果受寒得病，成何体统，赶快取火来御寒”，几位在密室烘火的太监这才把火盆端进来。朱翊钧对此却不闻不问。自万山二十四年（1596）坤宁、乾清二宫失火后，朱翊钧更是不再召见这位不为自己喜欢的皇长子，父子睽违。至于朱常洛的冠婚大礼，也是一拖再拖，阁臣、礼官、科道连年奏请，朱翊钧不是不予理睬，就是推称再稍候时月，全椒知县黄冈樊玉衡因此还被遣戍雷州卫。迫于众臣的一再坚请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，朱翊钧传谕为朱常洛选婚，然而拖了一年多又称此子身体清弱，大婚要往后推延，百官不得沾名烦聒。过了两年，朱常洛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，这在平常百姓之家大多也早已成婚，朱翊钧又推称原来的宫殿太狭小，待慈庆宫修成后，再作商议，诸臣不得繁阻。

朱常洛的处境，引起了慈圣皇太后的注意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正月的一天，朱翊钧到慈宁宫看望母后，慈圣太后问道：“常洛已经十九岁了，为什么还不册立为太子。”神宗随意答道：“他是都人之子！”一语道出心曲。不料，这个回答却刺到了他母亲的痛处，慈圣太后顿时大发雷霆：“你也是都人所生！”都人是内廷对宫女的称呼。朱翊钧看到母亲发怒，吓得跪伏在地，嘴里不停地说道：“马上册封。”

不过，一出慈宁宫，朱翊钧便觉后悔。数年前，他与郑贵妃便有密约。当时，宫内北上门的西面有一个大高元殿，供奉真武香火，据说颇具灵异，朱翊钧曾携郑贵妃进殿行香，要设盟誓，并且立下一张字据放在玉合中以为凭信。如今却如何向爱妃交待。朱翊钧在心里思忖着，迟迟下不了决定。正月初十，署礼部事右侍郎朱国祚又上了一道奏疏，内称皇长子年已二十，所选淑女习礼也已超逾一年，请早走三礼，并请为其他几位皇子加冠分封，朱翊钧这次没有发怒，只是诏谕他们耐心



等待。二月二十七日，次辅署内阁事沈一贯再请举行大婚，朱翊钧还是没有表态。八月底，慈圣太后再次与他谈及此事，朱翊钧不能再拖。

根据一些私家笔记的记载，就在这年里，郑贵妃对两件事情的处理，一度影响了朱翊钧对她的宠幸，从而导致他最后下决心要册立朱常洛为皇储。一次，朱翊钧病重，从昏睡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头正枕在王恭妃的手臂上，王恭妃满面戚容，泪痕犹湿，再窥视郑贵妃，却发现在秘密地盘算着什么，心中顿生不快。此前，朱翊钧曾与几位儿子小宴，每人各有小赐。朱常洛是给的一个玉碗，当时让郑贵妃代为收藏。现在，朱翊钧突然要她将赐给常洛的玉碗找出来，由于年月已久，已不知被丢弃到何处。接着又要赏赐给福王的東西，却是随手而进。朱翊钧便发起了脾气，立即升殿，诏令将负责收藏的宫人首级捉来。按照祖制，皇上升殿则宫眷俱都不敢进参，郑贵妃于是毁冠服，脱簪珥，蓬首跣足，率宫人匍匐于殿门之外，等待朱翊钧发落。次日，朱翊钧便传旨礼部：“速议册立仪制来看。”

经过一个来月的准备，终于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的十月十五日，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，移居迎禧宫。同日，册封三子常洵福王、五子常浩瑞王、六子常润惠王、七子常瀛桂王，分别居于储秀、咸福二宫内，以待长大后封藩就国。

二、“挺击案”

国本之争，皆因朱翊钧宠幸郑贵妃、有意立其所出福王常洵为储而起，因而她们母子的言行、朱翊钧对他们的一些逾制的举措，便也成为朝臣和社会舆论的焦点。

所谓妖书案，实际上有前后两起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春天，科臣戴士衡呈上一本，论劾前刑部右侍郎吕坤所辑《閤范图说》包藏祸心，请予查究重治。





吕坤（1636—1618），字叔简，号新吾，河南宁陵人。万历二年（1574）进士，历官山西巡抚，留意风教，举措公明，擢升至刑部侍郎。每遇国家大事，每每持正，丕为首鼠，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吕坤编辑《闺范图说》，这是一本近于刘向《列女传》的图书，在市井坊间迅速流传开来。据说，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、郑贵妃的兄长之子郑承恩见到此书名，便请人重刻，并新增节妇十二人，使全书后妃传中首为汉朝的明德皇后，而以郑贵妃传压轴，其用意自在抬高郑贵妃，将她与历代贤后并列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是说朱翊钧颇为喜欢小说剧本及音像诸书，太监陈矩在书坊见到吕坤的《闺范图说》后，便带了一套进宫，呈给皇上御览。朱翊钧随手便将此书送给郑贵妃看，郑贵妃感于此书为皇上所赐，遂制序重刊，颁示中外。其实，后一种说法乃是朱翊钧杜撰，意在为郑贵妃开脱，这是后话。

且说，此时皇储未定，举朝都把矛头指向郑贵妃，而一些对吕坤不满的人，认为藉此书可以中以奇祸，便将此书改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——《忧危谏议》，书前刊有翰林修撰、本朝学问大家焦竑（1541—1620）的序，书后又附有托名燕山朱东吉作的跋，内称“吕先生为此书也，虽无易储之谋，不幸有其迹矣，曾见从古以来有宫闱与现任刊书者乎？”，又暗刺张养蒙、刘道亨、魏允贞、郑承恩、邓光祚、洪其道、程绍、白所知、薛亨等外戚党人皆称吕氏所见极其高明。

吕坤此时正在家中养病，闻知被戴士衡参劾，即刻驰疏辩解：“戴士衡称郑承恩所刻之书，为臣所进，意在逢迎，对臣实在所疑太深。古时汉朝的刘向作《列女传》以献，成帝叹赏，臣所辑《闺范图说》，前述经传，后列贞淑，体依刘向，意本关雎，臣如果有所希冀，自可明白进呈，何必回护而犯此危险之迹乎？皇上可召贵戚身边的近侍盘问：郑承恩是否与臣见过，此书是否由臣献入；再请皇上敕下九卿科检查有无包藏